



# 中国文化生态学史论

庄鸿雁 张碧波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庄鸿雁 张碧波 著

# 中国文化生态学史论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关于构建文化生态学的几个问题 .....	(9)
第二章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生态学 .....	(17)
第三章	
中华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格局 .....	(30)
第四章	
华夏文化中心与文化生态新格局 .....	(52)
第五章	
从文化生态学史视角看夏商周 .....	(77)
第六章	
至味与和味 .....	(90)
第七章	
从生态文化到文化生态 .....	(94)
第八章	
略说殷纣的饮食文化与商周文化的更迭 .....	(103)
第九章	
王官之学与哲学的突破 .....	(114)

第十章	
礼崩乐坏与诸子之学 .....	(146)
第十一章	
从开放到封闭的文化生态转换 .....	(161)
第十二章	
政治大分裂与文化大整合 .....	(175)
第十三章	
唐代——中国文化生态学史的新高峰 .....	(207)
第十四章	
从中华文化生态学史视角评辽宋金历史格局 .....	(226)
第十五章	
蒙古族主导下的历史统一新格局 .....	(242)
第十六章	
“千古同文之盛”——明清文化生态学 .....	(261)
后 记 .....	(275)

## 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是对人类文明史高级阶段的最新理论概括，是对人类社会史高级阶段的最新命题。生态文明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世界文明史发展的历史必然。

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说，在四个建设中均融入、均贯穿着生态文明内涵，经济建设之为经济生态学（中国已有生态经济学）、政治建设之为政治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这使生态学从自然科学范畴跨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来，生态学具有了综合性品格，具有了新型价值观的文化形态。

“融入”“各方面和全过程”，就是对四个古老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融入、渗透，改造老学科为具有新内涵的新兴学科，这是理论创新的过程。在生态文明与四个老学科的关系上，又提出“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融入”这一新要求。这是创造新学科的战略布局，是理论创新的新思维。

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思潮与行动，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20世纪90年代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格局与进程，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格局与进程，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对中国学术事业带来了冲击，也带来发展的动力。

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大整合，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大整合，中华文化在全球化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与大整合中发生着变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向综合性方向发展，这种综合性，影响着各学科的发展，并产生了新学科，改变着各学科的结构体系。

生态学在中国划归在自然科学范畴，但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在新兴力量崛起过程中，社会结构体系、国际社会结构体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国际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变化与影响直接作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向综合方向发展，生态学的综合化，出现了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等新科学、新概念，中国特色生态学应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元结合中产生。

生态学原属自然科学范畴，它涉及人天关系、人地关系，在人天、人地关系中的结构、互动、影响以及这些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及其规律的认识，在人天、人地间的环境的交互关系，以及交互关系中的综合与交叉、整合与质变的生态系统的结构上的动态变化，引起从自然环境的关注，转型进入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及其对文明生存、发展等文化生态之间发生交叉、互动甚至决定性影响。

生态学这种综合性变化，使它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互动交叉的综合性发展，使其具备了多视角的观察与认识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并构成了民族特色的生态哲学理念与生态行为准则。

中华上古三代的经典文献中多遗留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态诸问题。

例如《尚书·尧典》和《尚书·禹贡》等。

《尚书·尧典》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将“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与“敬授民时”、将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作为主、客体放在

同一个视角上观察与认知，构造了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将神圣、神秘而不可知的、只由少数人（巫覡）掌握的天象历法、宇宙自然人间化，以之与人间社会的生活、生产，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关联，使它们之间具有同一性、互动性，创造了天文与人文同构的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形态，首次接触到自然世界与生态体系诸问题。

《尚书·禹贡》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阐述人与地关系的经典，它反映出夏代是产生中华文明中心观念与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认知体系的历史阶段，第一次接触到自然地理环境生态与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认识自然，掌握自然世界的生命规律，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周文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

“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麝不卵，以成鸟兽之长。”

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自然界即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然界是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世界，因此，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命。总原则是“畋渔以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土不失宜”，人类要做的就是“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国家要有储备以防灾荒，有十年积蓄的可以为王，有五年积蓄的可以称霸，没有一年积蓄的灭亡。生十个杀一个的财物堆积十层，生一个杀十个的财物顿时空虚。堆积十层为王，顿时空虚的灭亡。设立因灾问政，因灾罪己的制度。

据此，周文王提出“兵强胜人，人强胜天”的哲学命题、政治生态学命题。国家强盛，民众强壮可以战胜一切，可以战胜上天（自然）。

从自然生态到人文生态到政治生态，是周文王留给我们的生态学史上的珍贵遗产。

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学派提出天道观与人道观；庄老学派提出道法自然，这把前代的天人关系作了最精粹深邃的哲学概括。

至此，古老的天人关系——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

政治生态等基本上完成了体系化、哲学化的发展历程，是为中国的生态学模式。北京的天坛、地坛文化遗址，就是中华生态学史上还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产。

这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认真地研究与继承、发扬。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代东西方认识观念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天人同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连续性与整体性就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地与天，文化与自然，人类与宇宙是上下一体的、各种生命力之间互相交叉的宇宙体系的一部分。这种认识体系逐渐跨越万物有灵的文化意识阶段，从神本向人本转变，进入理性认知的历史文化阶段。

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古代文明的人与自然的认知体系。这里规定了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诫规，却没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诫规，从而演变为人类文明（基督教文明）所必须背负的原罪——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的局限。对这个问题，张光直先生归结为“破裂性文明”——“这种类型文明的特征不是连续性而是破裂性——与宇宙形成的整体论的破裂——与人类和他的自然资源分割性”。<sup>①</sup>很显然，在东西方古代文明史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这正表明东方与西方的古文明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文明本质。

在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结构体系建设过程中，既要面对国内问题，也要面对国际问题，对内对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均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体系问题。

自然生态文明、环境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体系的首要内容。

在 21 世纪的国际大家庭中，存在多重的生态危机。

---

<sup>①</sup>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496 页。



第一大生态危机是全球变暖，远因是西方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留下的祸根。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美国的能源政策、经济政策加剧了全球变暖的生态危机，而新兴力量的崛起，重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加重了这个危机，造成气候异常、灾害频发，严重影响着人类生存。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土地重金属污染、江河湖泊的水污染、碳排放的空气污染——雾霾灾害等；目前，在环境问题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不仅仅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而且体现在诸多环保议题上。早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形成《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中国很快制定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将全球环境问题聚集在水资源、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五个方面，而在这五个方面，中国至今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12年6月，联合国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特别关注七个领域：就业、能源、城市、粮食、农业、水资源、海洋、灾害。虽然人类不遗余力地推进了环境治理，但宏观趋势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使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的执行情况远未达到预期，全球环境危机不仅没有根本扭转，一些新环境问题反而层出不穷，无论面对旧环境问题凸显还是新环境问题增生，中国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向绿色能源革命前进，在再生能源领域投资，扶持光伏产业，使之成为战略性发展产业，减低化石能源分量，并努力提高化石能源质量。在这些方面，中国走在前面，西方世界则推迟化石能源向再生能源转变，在国际会议上尽量减低自己的责任与任务。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硬撞”。

中国民众在当前形势下，环境安全意识、生态文明意识有了显著提高，2013年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大大减少，就是一个明证。中国人作为地球村的优秀公民是大可期待的。

第二大生态危机，是冷战之后美国的一超独霸：美国实行外交军事化路线，美国式的战争就成为国际政治生态危机的主导性问题，武力成其第一选向，单边行为、单极路线是其主要表象。中国和世界应如何应对？

中国主张不分国家大小，一律平等，在国际关系上是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中国主张多极，反对单极；主张多边，反对单边。这是中华古老的和与同辩证统一哲学观念的现代化演绎。“五味的调和，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材料调和滋味，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声调使乐曲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五声杂，然后可听），物一无文（五色杂，然后成文），味一无果（五味合，然后可食果，美也），物一不讲（论校也）”——中华民族最了解阴阳相生，异味相和的道理。这种“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出千品具万方”方可“和乐如一”，国家方可大治。治国是这个道理，对世界也应是多极多元，方可合作共赢，即坚持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路线，以达到世界大同的境地。实现这样的生态文明观，需要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付出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惧怕新兴力量崛起，反对变革，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思维模式与西方文化的本质。

美国的“转向亚洲”的战略，是一种战略撤退，是为了缓解金融、经济危机，寻找新的出路；出于惯性思维（认为经济权力的膨胀必然随之政治和战略权力），为其巩固其世界霸主地位，不接受、不承认中国之为新兴大国，唯恐影响其霸主地位，战略力量转移东方，以期遏制中国，维护其全球规划制定者的优势地位。菲律宾瓦尔登·贝略在《转向亚洲战略成美遮羞布》中指出：“我们切勿忘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西方干涉的产物，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有着相似的历史。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中国及其邻国的能力，它们能携手打造地区新秩序，比美国军事霸权下的现有机制更能有效地促进和平、和谐以及尊重主权。”

经济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国际范围的金融、经济领域生态危机，是全世界瞩目的大事。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从美国漫延至欧洲，从金融领域扩大至经济领域，直至货币恶性贬值，掀起新一轮货币战争，出现所谓“安倍经济学”。

正如俄国总统普京指出的：“旧的经济权力中心的衰落可能影响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受到很大影响。“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十个重大变化：经济增速放缓超预期；消费成增长主要动力；企业利润整体下滑；股市持续萎靡下行；房地产市场逐渐回暖；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经济区域结构调整加速；外商投资增速放缓；人口和资源红利基本消失。”

从出口型向内需型转型，牵动着方方面面：一是民主政治诉求带动政治生态进入高度敏感期，国际范围的崛起与遏制更为激烈；需要以高度智慧创造新的国际博弈优势；提高文化软实力，进一步解放文化创造力，构造核心价值观，把民心提到民族复兴的新高度，这涉及文化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诸方面的建设。

金融危机是金融领域、经济领域生态危机的大爆发，它给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从八国峰会到二十国峰会，金融危机将改变国际战略结构，全球经济力量之从西方七国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这种经济力量的转移是政治力量发生平行转移不可抗拒的前奏”。从金融、经济生态危机到政治生态危机，全球战略结构体系变革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同列，并贯穿在生态文明建设之中，这应是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标志。

党的十八大强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凡此，均表明，这是新时代的新观念，它既是政治建设的内容，也是社会建设的内容，是社会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

生物场、生物圈，均有一个生态力场，大环境、小环境，均存在生态律动——由自然界到社会构成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生态文明体系。

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对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体系的基本性规定，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生态学史的初衷。希望我们的思考与研究对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能提供有益的信息与提示。

## 第一章

### 关于构建文化生态学的几个问题

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 是随着 20 世纪中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由分立、对抗走向融合的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是由美国文化人类学新进化学派学者斯图尔德 (Julian H. Steward) 在其 1955 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首次提出的。斯氏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 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 并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的特征及其类型的起源, 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集团的生存, 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其理论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因果关系。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此后, 文化生态学积极汲取生态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营养, 成为一门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自 20 世纪初叶起, 中国学者李大钊、冯友兰、梁漱溟等在探讨文化生成机制时, 就力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差异性、民族性, 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虽然没有把文化生态看作动态系统而是静态研究, 但启发了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省。

文化生态学是社会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融合后产生的综合性的新兴科学。

我们认为, 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产生它的环境的交互关系, 以及研究文化彼此间的交互关系的综合性新兴科学, 是以生态学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式来研究考察文化的生存、发展、融合、质变及其文

化生态系统之间的整合与规律诸问题。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制约于其特定的具体环境，这个环境是具体的、实在的，如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对文化生存、发展等文化生态发生互动，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而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如大文化与小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主体民族文化与非主体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文化本身的大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碰撞、交流、融合中的结构上的动态变化，建构新质文化价值观和确立核心价值观等问题，是文化生态学的重要内容。

文化生态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精神文化成果的诸方面，并且自成体系。

文化生态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国家与民族的软实力的提高，极具战略价值。

## 一、文化生态观念是中华 天人合一古老哲学的具体体现

### 1. 天文与人文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中华先民是最早探索天地之起源的民族。中华先民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天地宇宙无穷的生命，创造了种种宇宙洪荒的幻想与神话，自觉不自觉地将某些奇异的天象与人间社会紧密相连，在宇宙星空及其变化之间探求社会之变动、人事之沧桑、人间祸福之原因，从而凝结成“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哲学观念。“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中华先民观察宇宙之变化，星空之异动，均与人间社会紧密关联，“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天下之理得矣”，“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就”，构成天人互动、天人合一的古

典哲学观念。

在建构宇宙自然、人间社会的认知体系过程中，首先是从创造神话开始的。

有创世神话，如屈原《天问》所提出的“遂古之初，谁道传之”，《淮南子·精神训》、《天文训》对“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的探索，后有盘古神话、三皇传说、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神话，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中华古族的“本生日月”、汤谷扶桑“十日神话”等。这些神话是中华古族探求世界从哪里来，宇宙从哪里来，中华大地地理形势、日月星象是怎样产生的，山川河流、森林大地是怎样产生的诸方面问题，探天探地、问天问地，正是天文观念具象化为人文诸形态的表现。再如中华龙，其本义来于苍龙龙心的大火星，即最早的龙是作为星象存在取象于天宇东宫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为苍龙之体，则龙的原始形象是依东宫六宿所构成的形象<sup>①</sup>，呈现为兼具天文与人文的双重属性，龙之形象则为天文东宫六宿的人文具象化。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雌雄代兴而顺正至之统”；“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司马迁早已指出历数之学、天官之学与政事、与国家的密切关系，是直接表现天人关系——天文与人文的最高准则。《尚书尧典》开篇即讲“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观象授时是帝尧时代天官历数的总纲，是人天同构的宇宙（社会）认知体系的总原则。观察掌握日月星辰的变化，认识物候时序，据此安排与管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观察天象是为了敬授民时——天人同构、天人一体——在掌握与认知宇宙自然的运动规律时，与人间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秩序化、结构化对应起来，使国人走上理性思维的认知道路，天象为人间所用。观象授时成为中华古老的天人同构认知体系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生态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先民还有创生神话，探求人类从哪里来，族群从哪里来，探

---

<sup>①</sup>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索人类自身的秘密，是中华先民对人的产生、世界的产生、文化的产生做同一性的、创造性的、整体性的思维过程的独特思考。团蛋生人是创生神话的主要形态。“天地混沌如鸡子”、“梦日所逐”……凡此，均属团蛋生人神话；又有人生卵，如姜原生一肉蛋为周之后稷，柳花生一肉蛋为高句丽之朱蒙，均为人生卵的族源神话。还有石头生人、树癭生人等。

团蛋是个大宇宙——天圆地方，宇宙生人，人创造宇宙；团蛋是宇宙卵、太阳卵，它如人生卵、植物卵等均为大宇宙或小宇宙之化身，人吞鸟（太阳神）卵生子或人生卵，意味着人与宇宙一体，人生神化；宇宙生人，天人合一，人与宇宙同化。

## 2. 天道与人道

天命、天道、天论，对宇宙自然及其人间社会的关系的探索与认知，是中华先民孜孜以求的自然的、伦理的重大课题，是天人关系的日益深化的思维动态。

天有常道，地有常数，是中华古老的天道观、人道观。天道，自然之道，宇宙自然规律；人道，社会之道，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在商周历史大变动之际，周文王提出天道与人道的命题，表现出文化生态的多样形式。

“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可变，性在不改”；“兵强胜人，人强胜天”——“通道通天以正人”——用天道教育人，达到“信人畏天”——信人道，畏天道，以礼仪制度维护天道；天道、人道，“六方三述，其极一也，不知则不存”——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人道可以影响天道；天性不变而人性可以变；只要有了新观念，就可在制人与制天，制人与人制的关系上确立主动观，就可以从“人强胜天”进而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天人关系上，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周人的宇宙观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为周人代商，为建立新型的天人关系的思维模式奠定了基础。

中华先民在探索自然宇宙与人间社会及其关系中，从自然生态到人文生态，构建了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哲学观念，决定性地影响了



中华古史上文化生态系统的生成与发展。

## 二、和与同的对立统一观是中华 文化生态学的立论准则

和与同是中华古老的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孔夫子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和与同的对立统一论断，和与同是古代先秦时期人们流行的一个哲学思想，一个哲学用语，一个哲学概念。

和的概念，在历史文献上首见于《史记·殷本纪》之伊尹“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即和羹至味之说——用水用火为“味之本”，调和阴阳，刚柔相济，恩威并施为治国之本；而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咸协调各方力量，发挥各方职能，方可达到“至味”，方可治理好国家；特别要注意“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国家之变使之符合天地阴阳四时的变化，掌握变化规律；而做到“至味”，需备好各种名贵物质材料；治国应充分发挥调动各种物质的精神力量，这是“道”——至味之道——“道存于己之身而用之于天下之物”，“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这已经把和羹至味提高到道的高度，提高到自然规律、治国准则上来，作为治国论，国家文化论、文化生态论，创造了国家文化学的最高境界，创造了“以味为美”的古典哲学观念。和羹至味就在多元文化的整合中达到或创造了一个文化生态发展的平衡境地。这是“食以体政”、“寓道于食”、“寓礼于食”的古老观念的具象化。

故先秦诸子庖宰饮食与治国之道联系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如老子之“治大国如烹小鲜”、庄子的庖丁解牛等庖宰烹饪为喻，阐发各自的文化生态观念和社会哲学。

《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景公和晏婴讨论和与同的异同时，晏婴批评梁丘据不懂得和与同的区别，以和羹为例，引申到“济五味，和五声”，方可“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心平，德